

# 真宗教團與國家： 以大谷光瑞的臺灣活動為考察中心\*

許瓊丰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

## 摘 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展開侵略中國、向南推進的南進政策，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逐漸明顯。臺灣總督府試圖調整臺灣的資源運用，先是在1930年召開臨時產業調查會，接

---

\* 本論文主要利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原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電子資料庫、數位典藏服務網日文舊籍資料撰寫。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5年10月14-15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論文撰寫期間，感謝（日本）新潟大学國際センター准教授柴田幹夫、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關正宗指導，研討會評論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教授江燦騰點評，獲益甚深。

編者按：近年來日本以新潟大學柴田幹夫為首的學者們，結合成一研究真宗本願寺派法主大谷光瑞的研究團隊，重新理解並展開以「國家前途」為著眼的大谷光瑞研究。日據時期，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大谷光瑞在高雄建立逍遙園，並推進南進政策，以配合日本帝國擴張。臺灣幾乎無人關心此一議題，本文以臺灣殖民時期為中心，檢視大谷光瑞這位集僧侶、宗教家、探險家、政治家於一身的人物，對臺灣的理解與認識，以冀後有來者。

著1935年舉行熱帶產業調查會，又在翌年1936年設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開啟臺灣產業結構轉變與開拓華南、南洋的新階段，臺灣因此成為日本南進的玄關與擔負軍需生產的基地。回顧這段歷史，學者利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檔案，在分析日本的對外政策以及臺灣產業發展方面，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

大谷光瑞不僅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法主，且與大正天皇為連襟兄弟，同時他的探險活動足跡遍及中亞地區，又因佈教與中國結成緊密關係，並且是著手南洋熱帶產業的先驅，然後從1930年代開始關心臺灣的熱帶產業發展，是能反映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亞洲地區局勢變遷與日本帝國對外發展的奇特人物。

大谷光瑞在日本是具名望的宗教家，因此歷來對他的討論多由宗教史觀點討論再旁及與臺灣的關係，然實際上在上述1930年代臺灣被視為帝國前進南方基地之際，因臺灣熱帶產業及資源開發的問題，而緊密了大谷光瑞與臺灣的關係。本研究擬以大谷光瑞為連結，透過他在亞洲地域的移動，得以明瞭因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所帶動出人的移動之影響，並由他的活動來看一位日本人對1937年後的臺灣認識。

**關鍵詞：**大谷光瑞、逍遙園、熱帶產業調查會、南進政策

# **The *Jodo Shinshu* Buddhist and State: Analysis of Kouzuki Otani's Activities in Taiwan**

Chiung-feng Hsu

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 **Abstract**

The Mukden Incident in 1931 led to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Policy. The goal to establish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solidified.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aiwan, the Taiwan *Sōtokufu*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Formosa) set up the Provisional Commission for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in 1930 and the Research Committee for Tropical Industries in 1935.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These establishments set ou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unveiled the South China and South Seas policy. Taiwan became Japan's entry hall to the

Southeast Asia and a base of providing military supports.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is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the authors analysed the dossiers of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 Ltd. to examine Japan's foreign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authors have obtained new insights and fruitful results.

Kouzui Otani was not only the High Priest of the *Hongan-ji* School of *Jodo Shinshu* Sect, but also the brother-in-law of the Emperor Taisho. He travelled through Central Asia as an adventurer, and form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le preaching there. Moreover, Otani was a pioneer of the tropical industries in Southeast Asia. He showed interest in the tropical industries in Taiwan in 1930. His life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Asia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from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o the mid-20<sup>th</sup> century.

Kouzui Otani was highly respected in Japan for his devotion to religion. Therefore, most discussions about him are mainly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and may possibly be extended to hi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n fact, Otani'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as tightly forge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opical industries and the use of resources in Taiwan to support Japan's advance on the Southeast Asia.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movement of Kouzui Otani in Asia, this study intends to find out the impact of Japan's imperialism on people's movement, as well as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Taiwan after 193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Japanese.

**Keywords:** Kouzui Otani, *Shoyoen*, the Research Committee for Tropical Industries,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Policy

## 一、前言

西元1931（昭和6）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展開侵略中國、向南推進的南進政策，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逐漸明顯。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試圖調整臺灣的資源運用，於是以產業為對象，先是在1930年召開臨時產業調查會，接著1935年舉行熱帶產業調查會，而在翌年1936年設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開啟臺灣產業結構轉變與開拓華南、南洋的新階段，臺灣因此成為日本南進的玄關與擔負軍需生產的基地。<sup>1</sup> 回顧這段歷史，學者利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檔案，在分析日本的對外政策以及臺灣產業發展方面，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

大谷光瑞不僅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以下略稱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法主，與大正天皇為連襟兄弟，同時，由於他的探險活動足跡遍及中亞地區，又因佈教與中國結成緊密關係，1930年代開始關心臺灣熱帶產業發展，是能反映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的中期亞洲局勢變遷與日本帝國對外發展的奇特人物。

---

<sup>1</sup> 小林英夫著、許佩賢譯、鍾淑敏·蔡采秀校訂，〈從熱帶產業調查會到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年），頁41-68；河原林直人，〈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産業政策の転換期—臨時産業調査会粗描—〉，《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51卷1号（2006年9月），頁93-111；河原林直人，〈植民地官僚の台湾振興構想—臨時台湾經濟審議會から見た認識と現実—〉，收入松田利彦·やまだあつし編，《日本の朝鮮・台湾支配と植民地官僚》（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年），頁615-641；長岡新治郎，〈熱帯産業調査会開催と台湾総督府外事部の設置〉，《東南アジア研究》18卷3号（1980年12月），頁90-103；河原林直人，〈熱帯産業調査会開催過程に観る台湾の南進構想と現実—諸官庁の錯綜する利害と認識—〉，《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47卷4号（2011年3月），頁111-133；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1年）等。

從1930年代起，日本加速前進中國大陸的政策，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爆發戰爭，臺灣隨著日本進入戰時體制，並被視為帝國前進南方之基地。於是日本帝國與總督府著眼於臺灣資源的調整，南方熱帶產業的開發；光瑞也從此時開始積極往來臺灣，提倡臺灣與南洋的熱帶產業發展，可以說戰爭的爆發促使光瑞與臺灣的關係緊密。由於光瑞為西本願寺法主，在日本是具有名望的宗教家；又對西本願寺有許多貢獻，因此關注他的研究多為日本學者，並多由宗教史觀點來看他的探險活動，乃至由在中國的發展來討論他對「國家」前途的思考。而討論他與臺灣的關係，雖有加藤斗規與柴田幹夫兩篇論文，但筆者認為雖然呈現了光瑞對臺灣的重視，但仍未表現出臺灣重視光瑞的層面。<sup>2</sup> 另一方面，臺灣對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宗教研究，陳玲蓉、蔡錦堂的研究主要在日本對臺灣的宗教政策的關注；<sup>3</sup> 江燦騰、闕正宗等則由宗教史觀點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的發展，以及各宗派在臺灣的佛教推廣與宗教組織，再論及皇民化時期的佛教，這是對臺灣佛教整體發展與影響的探討，並且這些研究中，有許多時候也將討論時期跨越至戰後，其中惟

---

<sup>2</sup> 白須淨真編，《大谷光瑞と国際政治社会—チベット・探検隊・辛亥革命》（東京：勉誠出版社，2011年）；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の研究—アジア広域における諸活動》（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年）；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頁116-128；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台湾—「逍遙園」を中心にして〉，《大谷光瑞の研究—アジア広域における諸活動》（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年），頁113-140。

<sup>3</sup>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年）。

有黃朝煌以大谷光瑞的高雄別邸逍遙園為題，討論他的建築與殖民地都市發展關係。<sup>4</sup>

也就是說，截至目前的研究，光瑞除為宗教家外，同時也被定位是探險家、日本敦煌學的創始者、政治家、實業家等身分，然而他為何能秉持這樣的熱情呢？他的摯友德富蘇峰（AD.1863-1957）撰寫光瑞傳記時，描述光瑞出生時的1876（明治9）年，正與在牡丹社事件中擔任日本征臺都督西鄉從道（AD.1843-1902），同處於擁護明治政府，有著強烈建設新國家意識的明治維新時代，其精神便是讓日本也能和西歐國家同樣成為世界文化強國，而這便是以開國進取作為手段來實現的明治精神。<sup>5</sup>若從這段話來看，秉持這種以伸張國勢為信念的光瑞，如何在臺灣付諸實際行動，凸顯探討他積極在臺灣發展產業活動的必要性。本研究擬在上述基礎上，以光瑞做為連結，透過他在亞洲地域的移動，來明瞭因日本帝國發展所帶動出人的移動之影響，<sup>6</sup>並由他的活動來看一位日本人對1937年後的臺

---

<sup>4</sup> 江燦騰著作列舉如下：江燦騰，《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江燦騰，《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去殖民化與臺灣佛教主體性確立的新探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江燦騰、侯坤宏、楊書濠合著，《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臺北：五南圖書，2011年）等；闕正宗著作列舉如下：闕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4年）；闕正宗，《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新北市：博揚文化，2011年）等；黃朝煌，《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高雄：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sup>5</sup> 大谷光瑞猊下記念會編，《大谷光瑞師の生涯》（東京：大空社，1994年），頁11。

<sup>6</sup> 臺灣被日本統治後，臺灣人成為日本帝國臣民，可以前往日本經商或留學，

灣認識。

## 二、明治精神與大谷光瑞

要說明大谷光瑞積極向外發展的明治精神，須從西本願寺談起。西本願寺是淨土真宗之一派。淨土真宗是日本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約十二世紀鎌倉時代由法然（AD.1133-1212）的弟子親鸞（AD.1173-1263）創立，是繼承法然的日本淨土宗而發展的教團。至1602年德川家康為解決本願寺繼承人的糾紛，支持長兄教如（AD.1558-1614）創立新教團，是為東本願寺派，又稱大谷派，三男准如（AD.1577-1631）一脈則仍稱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簡稱本願寺派、西本願寺派。在1923（大正12）年親鸞聖人誕辰750年、立教開宗700年之際，各派達成協議，即奉行淨土真宗的根本論典《教行信證》的教團，組成「真宗教團連合」，分別是「本願寺派、大谷派、高田派、興正派、佛光派、木邊派、田雲路派、杉元派、誠照寺派、三門徒派」等十派，其中本願寺派在1932年（昭和7）年，擁有9,700餘寺，是勢力最大的教團。<sup>7</sup>

西本願寺的精神在實踐日本佛教的「真俗二諦」、「鎮護國

---

另方面，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背景下，也造成人群或個人的移動，例如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約有5千人短暫停留或定居在中國東北的滿洲，再者第3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及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等也都在臺灣與中國大陸東北、北方活動。參閱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1。

<sup>7</sup> 高楠順次郎編，《中等教科書佛教辭典》（東京：大雄閣，1932年），頁139-140；參閱真宗教團連合，網址：<http://www.shin.gr.jp/>，檢索日期：2016年10月7日。

家」思想。「真俗二諦」思想，溯源自篤信佛教的聖德太子（AD.572-622）在《三經義疏》中，指出佛教信仰絕對不能停留於不食人間煙火的修禪，而應積極融入於國家與社會的生活，在社會大眾中觀察，瞭解諸法實相的真理，才能走出正己化人的佛教修行大道。<sup>8</sup> 其後，本願寺第八代門主蓮如上人（AD.1415-1499），為淨土真宗之祖親鸞聖人尊崇的聖德太子主張之「真俗二諦」做總結——即親鸞聖人的「淨土真宗祖親鸞聖人之一義，不以出家發心之形為本，不標榜捨家棄欲之姿」，亦即不必拼命認為要努力去除自己內心的罪惡或者妄念妄執，信徒可以照樣從商，在政府機構任職，或者從事魚類、農業等工作。<sup>9</sup> 另外，就「鎮護國家」來看，佛教自中國傳入日本後，首先遭遇崇佛與排佛之爭，故在融合過程中，佛教逐漸被認為是可以解決當時國家與社會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故聖德太子強調「正法興隆」。在歷經這樣的過程之後，至奈良、平安時代除了被日本完全接受，更成為鎮護國家的工具。<sup>10</sup> 由於這樣的背景，因此日本早期立教開宗的祖師，最大貢獻多與鎮護、安定國家有關，「國家佛教」也就為日本佛教史最大的特色

---

<sup>8</sup> 花山信勝，〈日本佛教の實踐〉，《南瀛佛教》20卷12号（1942年12月），頁2-7，參閱臺灣佛教史料庫，網址：<http://buddhistic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ny/index.php?i=ny20-12>，檢索日期：2016年10月18日。

<sup>9</sup> 花山信勝，〈日本佛教の實踐〉，頁2-7。

<sup>10</sup> 坪井俊映，〈護國佛教史上に於ける淨土教の地位〉，《南瀛佛教》20卷10号（1942年10月），頁4-8，參考臺灣佛教史料庫，網址：<http://buddhistic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ny/index.php?i=ny20-10>，檢索日期：2016年10月18日；羅玲，〈從“草堂佛教”到“護國佛教”：論佛教傳入日本的社會條件〉，《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卷3号（2011年5月），頁18-21。

與本質所在了。<sup>11</sup>

從上述可知，由於日本佛教史的發展背景，以及西本願寺本身發展已達一定規模，因此大谷光瑞如何展開他的信仰與事業，將是以下要探討的。

大谷光瑞（AD.1876-1948）出生於西本願寺宗教世家，是西本願寺第21代法主明如上人大谷光尊（AD.1850-1903）之長男，幼名峻麿，自幼學習書法、佛書、漢籍經典等，9歲剃髮得度法號鏡如，曾分別進入學習院與共立學社，期間習得英文、算術、測量、地理等科目，之後返回京都跟隨佛教學者前田慧雲修習佛教學與真宗學，眾多科目的學習培養了深厚的學術素養。1898年光瑞與九条道孝公爵的三女籌子（AD.1882-1911）結婚，妻子籌子也是日後大正天皇之皇后貞明皇后的姊姊，由於這層淵源，光瑞成為皇室的一員。<sup>12</sup>

西本願寺在明治時期教勢興盛，源自在明治天皇推行維新時，為使神道國教化，而實施神佛分離及廢佛毀釋政策。西本願寺面對這樣的教團存亡危機，實施了教團近代化，引進近代學校制度培養人才、從事慈善事業、刑務教誨、海外佈教、軍隊佈教等入世事業。<sup>13</sup> 1894（明治27）年7月爆發甲午戰爭，是西本願寺首次派遣海外從軍佈教師的開始，先是登陸澎湖，接

---

<sup>11</sup> 坪井俊映，〈護國佛教史上に於ける淨土教の地位〉，頁4-8。

<sup>12</sup>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小伝〉，收入氏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頁24-25；王娜，〈中國の大谷光瑞像及びその研究について〉，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頁21。

<sup>13</sup>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研究の実情と課題〉，收入氏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頁4。

著陸續有名和淵海、下間鳳城、大江俊泰、武內外量、小野島行薰、豐田巍秀、長尾雲龍等人赴臺。<sup>14</sup>

日本統治臺灣後，從1896年1月開始在臺灣展開對日本人、臺灣人、原住民的佈教事業，翌年1897年借用臺北北門至道宮，成立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巡教使駐在所，並設置明倫學校（後改稱龍谷學校），不久也在臺南、臺中、鹿港、苗栗、新竹設佈教所。同時1897年3月時的統計已有12間臺灣寺院歸屬及17名臺灣僧侶、2027等多戶的臺灣人歸屬，同時佈教駐地也擴及基隆至高雄，及屏東、臺東等。1899年決定建寺，於是在本山補助金和信徒捐款下，於艋舺新起街開始建築工程，同時升格為淨土真宗本願寺臺北別院。此外，開設國語傳習所，教導臺灣人日語，並在臺南設立開導學校、臺北及臺中設立龍谷學校、鹿港設立敬愛學校等，教授日文與漢文。<sup>15</sup> 以上對臺灣佈教事業基礎的奠定是在光瑞父親明如上人時期。

光瑞於1899年結婚後，隨即展開海外旅行，先是巡遊中國上海、北京等沿海開放港口與內陸的漢口等，接著朝拜印度佛教遺跡與視察歐洲宗教情況，停留在英國3年期間，除了研究與調查，同時也成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一員，受斯坦因的中亞探險影響，開啟了對中亞的探險興趣。<sup>16</sup> 1902年為了解決佛教史上的問題，因此籌劃西域探險，以蒐集佛教經論、佛像、佛

---

<sup>14</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頁2。

<sup>15</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3-5。

<sup>16</sup> 川邊雄大，〈大谷光瑞と中国布教〉，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頁11；王娜，〈中國の大谷光瑞像及びその研究について〉，頁23。

具等，以助佛教教義的探討與考古學的鑽研，8月15日於倫敦展開首次西域探險，經由柏林到莫斯科後，南下亞塞拜然、土庫曼、吉爾吉斯共和國、喀什噶爾、葉爾羌，其後抵達帕米爾的塔什庫爾幹鎮，再通過巴基斯坦，在11月9日抵達喀什米爾西部的斯利那加，進行佛教遺跡的探險。<sup>17</sup> 他後來將收集了數量龐大的佛教經論、佛像、佛具等藏放於神戶二樂莊別墅，有鑑於日本與中國關係的緊密，又在別墅內設立武庫佛教中學及清語研究所。他在1903年因明如上人圓寂而返日，以年28歲繼承本願寺第22代法主，法號鏡如上人，繼承爵位，正五位敘勳。

光瑞接任法主後，翌年1904年爆發日俄戰爭，於是在西本願寺本山設立臨時部，進行中國戰場的佈教工作。1907年5月13日受明治天皇召見，賜予勅語。

明治37、8年戰役，繼承先人遺志，獎勵門徒奉公，又派遣從軍僧侶至出征部隊，鼓勵士氣，厥功至偉，朕深表嘉許。<sup>18</sup>

受到明治天皇的褒獎以及信徒增加，可說光瑞將教勢帶向一個發展的高峰。又因日本勝利，預期將能擴展在中國的佈教——從1906年開始，光瑞忙碌於中國考察，不僅謁見了清皇帝及慈禧太后與大臣等，也因辛亥革命時，在清國開教總監內，設置特設臨時部，進行救護活動，獲得清朝廷與革命軍雙方表揚，爾後1918年成為孫文廣州護法軍政府的最高顧問。<sup>19</sup>

另外，臺灣佈教事業的制度，在明如上人時期，開始制定

---

<sup>17</sup> 大谷光瑞殿下記念會編，《大谷光瑞師の生涯》，頁132-134。

<sup>18</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83。

<sup>19</sup> 川邊雄大，〈大谷光瑞と中国布教〉，頁9-19。

並頒布相關監督章程，1897年和1903年分別頒布〈臺灣佈教監督職制〉及〈臺灣佈教取締職制〉，根據章程，分別有佈教監督與佈教使取締的任命、派遣。到了光瑞任法主時期，於1906年2月14日將臺灣納入1905年頒布的〈開教地總監規程〉中，臺灣與中國、韓國、樺太（庫頁島）、北美洲一樣設置開教總監，臺灣開教總監擔負監督臺灣及臺灣諸島、福建省、廣東省、香港的責任。1907年6月將臺灣編制於日本佈教總監，成為第十七管區，故廢除臺灣佈教取締，改為派遣第十七管區採訪使。<sup>20</sup>

在臺灣編入第十七管區時，日本實施教團、總班制來進行佈教，臺灣為第31總班，隸屬第五教團，同時也因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開通，更有利佈教。據採訪使兼輪番紫雲玄範（AD.1862-1933）的〈臺灣視察復命書〉（AD.1909），已知設有一院（臺北）、二寺（基隆、鹿港）、六佈教所（新竹、苗栗、臺中、臺南、打狗（高雄）、澎湖）、三說教所（古亭村、鳳山、鹽水港）、<sup>21</sup> 二駐在所（嘉義、吳全城（賀田村）），及籌設中的彰化、阿緱（屏東）、蕃薯寮（旗山）等佈教點，1910年紫雲玄範被任命為第三十一總班長後開始大舉佈教，直至1913年計有三次全島臨時佈教大傳道，以第三次來說，設立62個會場，進行以「聖德奉讚」、「國本培養」為主旨的演講及說教，可說進入全盛時期。<sup>22</sup>

另外，臺灣在日俄戰爭期間的活動都暫停，僅有軍人優待

---

<sup>20</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5-7、65-68。

<sup>21</sup> 有關此期來臺的日本佛教與說教所，可參考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臺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年2月），頁191-222。

<sup>22</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68-73。

會做恤兵慰問，待戰爭結束後，才開始佈教與社會事業。在監獄教誨事業方面，為預防釋放者再犯而設置實施保護誘導的場所，從1905年臺南累功舍開始，1907年有臺北的一新舍及臺中的再生舍，為了對在臺日本人與臺灣人的不良少年實施感化教育，1909年創立成德學院。為配合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1910年先派遣佈教使10名進入山地，分駐十個地點，引導原住民與兒童參拜臺北別院，並實施「蕃童」教育，同年開始也配合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展開生蕃討伐隊慰問。<sup>23</sup>

在頒布〈開教地總監規程〉這段時期至1914年頃，西本願寺在各地開始擴展，1904年在彰化買官地，1909年取得彰化廳建立佈教所的許可，1910年在新竹創建竹壽寺，1912年向新竹廳購苗栗一堡苗栗街官有地（1926年建苗栗寺），1913年購臺北廳基隆堡基隆街官有地，1914年在臺北廳大加蚋堡古亭庄建了覺寺，又在澎湖廳媽宮街建立真宗本願寺光玄寺。<sup>24</sup>

由上可知，臺灣的佈教由光瑞的父親大谷光尊開始，而在光瑞接任法主後至1914年辭去法主期間是佈教事業蓬勃發展之時。但實際上，光瑞在擔任法主時並未來過臺灣，這期間不僅妻子籌子亡於1911年，而在1914年更因疑獄事件<sup>25</sup>而辭去西本

---

<sup>23</sup>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95-114。關於此時期「蕃地」的佈教事業是以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為主的探討分析，可參考范純武，〈日本佛教在日治時期臺灣「蕃界」的佈教事業：以真宗本願寺派為中心的考察〉，《圓光佛學學報》第4期（1999年12月），頁253-279。

<sup>24</sup> 黃朝煌，〈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頁49-50。

<sup>25</sup> 疑獄事件是指，1914年本願寺教團挪用真宗生命保險會社及慈善會的資金，以及宮內省收購位於神戶須磨的大谷家別墅之際，贈送宮內省大量金錢與貴重物品的事件。由於捲入宮內省的事件，光瑞負有責任，於是請辭本願寺住持、本願寺派管長之職。請參閱柴田幹夫，〈大谷光瑞小伝〉，頁35。

願寺法主與西本願寺派管長，和伯爵爵位。影響所及是斷絕了領導西本願寺的佈教活動和中亞探險活動。再者，由於中國政局動盪，光瑞於是將目光轉為熱帶產業開發，從此展開常住海外與產業開發之途。<sup>26</sup>

從以上來看，在西本願寺轉化為近代化的教團時期，日本正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積極向外擴展勢力範圍，光瑞開始中亞探險與中國的佈教視察，另一方面，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西本願寺在臺灣也從軍佈教使轉為開教使，以「聖德奉讚」、「國本培養」為宗旨，配合臺灣總督府的政策，進行佈教與「理蕃」政策，這樣的行動時間也是在光瑞擔任法主的時期，並且都是處在日本向外拓展勢力的背景下來發展，應該就是他對明治維新「開國進取」的體現。<sup>27</sup>

### 三、由《臺灣日日新報》看大谷光瑞與臺灣

大谷光瑞辭去本願寺法主後，雖然仍頻繁往來中國，但另一個重大的轉變是他在南洋的熱帶產業開發。他對南洋的關注，其實仍來自於日本帝國的對外政策，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對外擴張的思想與行動已然成熟，儘管內部有北進或南進爭論，但將南洋納入日本勢力範圍仍為一項目標，因此，1915年成立以發展南洋事業為中心的組織「南洋協會」。值得關注的是，南洋協會的成立，是與深知臺灣處於南進之重要地位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推動有密切關係，他是南洋協會會頭，並且總督府亦有比日本本國更為仔細的南洋研究和與實業

---

<sup>26</sup> 川邊雄大，〈大谷光瑞と中国布教〉，頁9-19。

<sup>27</sup>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研究の実情と課題〉，頁14。

家的緊密聯繫。<sup>28</sup>

西元1914年至1930年期間，光瑞持續重視中國與東北滿洲外，也注重熱帶產業發展。1917年2月在泗水設立「蘭領東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同年11月首次赴臺灣，約短暫停留三星期，後在1920年獲總督府補助6千圓，進行西里伯斯島的資源調查，<sup>29</sup> 1926年還遠赴土耳其發展。光瑞從最初以中國為中心的活動，至辭去法主後轉向南洋與臺灣，究其原因，當時他在中國的活動受到影響時，提倡亞細亞主義，提出欲解決中國問題、實現亞細亞主義，需將南洋荷屬印尼的開發視為當務之急，只是他在爪哇的事業，卻在1930年以後大幅縮小，於是光瑞在1930年再次來到臺灣，至1935年後更是頻繁往來臺灣。從初次到臺灣至再次赴臺，期間雖相隔12年，但西本願寺與臺灣佛教有密切關係，而他又曾為西本願寺法主，且與總督府有聯繫，故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對大谷光瑞抱持一定的關注並做動態報導。關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由光瑞的身分與活動可由幾個分期與方向來看。

### (一)1903年～1917年

《臺灣日日新報》對大谷光瑞最初的報導，始於1903年3月

---

<sup>28</sup>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期（2004年12月），頁154-156。

<sup>29</sup> 殖產局商工課，〈自大正四年南支南洋邦人助成事業一覽表〉，《昭和十年八月）熱帶產業調查書：南支南洋ニ於ケル邦人企業ノ助成》（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5年）；加藤斗規，〈大谷学生と南洋〉，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頁248-269。

5日因父親明如上人病逝，由檳城乘船返回日本的記載，<sup>30</sup> 之後分別在1904年、1909年、1914年零星報導光瑞的夫人籌子在日俄戰爭中，進行婦人愛國演說與出征家族慰問；光瑞在中國的考察活動，以及辭去法主後的動向。其中尤以1914年〈移住地は布哇か南米か〉一篇，稍有篇幅地報導他在疑獄事件後，面對在日本國內的生存困境而必須走訪海外的處境。<sup>31</sup> 橫跨十餘年的時間，卻僅有幾則的新聞，若非由1917年的訪臺報導，很難看出往後他在臺灣的地位與產生的影響。

光瑞在1917年11月16日來到臺灣，由基隆上岸後隨即轉入臺北，雖然接受臺北西本願寺信眾的熱烈歡迎，但此行重點在臺灣的實地考察。<sup>32</sup> 在光瑞抵達臺灣前，《臺灣日日新報》已於9月27日介紹他之前的南洋考察概況；<sup>33</sup> 而自抵達臺灣後，在東洋協會、南洋協會、警察協會、臺灣教育會安排下，於11月20日在臺北城南小學校演講「南洋視察談」，內容由日本與南洋的開發與未來發展的必要性談起，其中尤以荷屬印尼、新幾內亞、婆羅洲、蘇門達臘、西里伯斯等為重點，就其人口、南洋地理氣候等，談到開拓農業、工礦業之必要性，以求南洋之發展。<sup>34</sup>

---

<sup>30</sup> 〈大谷光瑞伯〉，《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3月5日），1版。

<sup>31</sup> 〈大谷光瑞師の直諭〉，《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2月19日），5版；〈西本願寺裏方の遊説〉，《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5月7日），5版；〈大谷光瑞法主の行程〉，《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29日），1版；〈大谷光瑞氏外遊か（移住地は布哇か南米か）〉，《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23日），4版。

<sup>32</sup> 〈大谷光瑞氏來臺 / 本願寺信徒歡迎〉，《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5日），7版。

<sup>33</sup> 〈南洋視察談〉，《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7年9月27日），6版。

<sup>34</sup> 〈大谷光瑞講演會 / 聽眾數千講堂に溢る〉，《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1日），2版。

然後展開西部視察活動，在途中作了預定行程變更後，由預定的18天改為11月22日-12月3日間的12天活動，分別停留臺中、嘉義、阿里山、打狗（高雄）、臺南。當他在打狗當地參加午餐會時，曾談到：「打狗是優秀的港口，若能投入資金將能保有品質……發展打狗港將能取代香港中轉貿易」，重視高雄港的位置，可以說是因為這是面向南洋的玄關。<sup>35</sup>

除了對光瑞行程的報導，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天臺沙門西田教道撰〈大谷光瑞伯を迎ふ〉，<sup>36</sup> 及明治、大正年間曾為《臺灣日日新報》報社主筆的著名作家田原天南（AD.1868-1923）撰〈大谷光瑞師〉<sup>37</sup> 的兩篇文章。1. 西田教道雖由宗教討論為開頭，但實為支持光瑞的南洋發展，認為此行動是融合了宗教與國民性，並呼應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AD.1875-1957）對和平的提倡，使日本實現進步、現代的生活，而熱切歡迎並期待大谷光瑞的訪臺。2. 田原天南是首次向臺灣詳細介紹光瑞的

---

<sup>35</sup> 〈大谷師日程〉，《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1日），2版；〈大谷師動靜〉，《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3日），2版；〈打狗に於る光瑞師午餐會 / 話題轉轉として / 興味津津たり〉，《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9日），7版。

<sup>36</sup> 西田教道，〈大谷光瑞伯を迎ふ〉，《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6日），4版。

<sup>37</sup> 本名田原禎次郎，是明治、大正年間的著名的記者與作家，獨逸學協會學校（現獨協大學）畢業，後受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邀請，擔任《臺灣日日新報》報社主筆，1918年於北京設立京津日日新聞社（日華新聞），參考田原純一，〈明治—大正 国際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先覚者気骨の言論人：天南こと田原禎次郎について〉，網址：<http://homepage2.nifty.com/tahara~d-c/teijiro.html>，檢索日期：2015年8月3日。田原天南，〈大谷光瑞師（一）〉，《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8日），7版；〈大谷光瑞師（二）〉，《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0日），7版；〈大谷光瑞師（三）〉，《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1日），7版；〈大谷光瑞師（四）〉，《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2日），7版；〈大谷光瑞師（五）〉，《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23日），7版。

經歷，推崇他的學識涵養，再由他所持的「大亞細亞主義」政治主張，強調他對南洋考察的貢獻與將實現的成果。由以上兩人的文章能看出，大谷光瑞的南洋考察是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手段之一，而臺灣正是通往南洋的玄關，也是「國家的前途」所必行的路徑，正可以解釋光瑞在此行受到的重視以及與總督府關係的建立。

## (二) 1918年～1934年

光瑞在1917年12月31日結束初次訪臺後，在1930年12月23日曾短暫來臺，爾後，於1935年才開始頻繁來往臺灣。比起上述的階段，這期間《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能從幾個層面看到更為詳盡的刊載。

從光瑞的農業開拓來看，如前述1918年他延續先前的南洋考察，開始著手南洋的熱帶產業發展，《臺灣日日新報》在此方面是依據他的實際行程來做報導，從1918年1月1日結束了臺灣的訪問，由基隆離開回到日本九州北部的門司，之後再前往南洋開始，<sup>38</sup> 以他在南洋發展的思考與現況為中心，包括大谷光瑞在荷屬メナード開發的椰子油工業、木材加工、水力電氣、灌溉等，處處可見他對南洋抱持著具有開發潛能的期待。<sup>39</sup> 另外，自該年3月1日〈福建丸救助さる／更に南洋漁業に従ふ〉報導中，瞭解光瑞此時嘗試從事漁業發展，<sup>40</sup> 於是購入「光洋丸」

<sup>38</sup> 〈大谷師出發〉，《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8年1月1日），6版。

<sup>39</sup> 〈光瑞氏の事業／南洋で椰子油の製産／製材、水利電氣、灌溉〉，《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月9日），8版；〈南洋行途上の大谷光瑞氏〉，《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月21日），6版。

<sup>40</sup> 〈福建丸救助さる／更に南洋漁業に従ふ〉，《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1

以圖發展，未料該船竟遭遇沉沒，此時，「凌海丸」協助搜尋。

「凌海丸」是總督府水產所從1917年12月開始的南洋水產調查試驗船，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一帶多從事調查，其中調查的西里伯斯馬納多是光瑞的事業經營地點，後來在翌年1918年聽聞「光洋丸」沉沒時，立即協助搜尋。從這點來看，總督府在發展南進政策的同時，看到光瑞的南洋政策並試圖探索其可行性。<sup>41</sup> 又，光瑞在1920年與總督田健治郎（AD.1855-1930）搭船赴門司途中，彼此熱切交換了統治臺灣與南洋政策的意見，可說是彼此關係密切的進一步表現。<sup>42</sup>

然而，此時光瑞對臺灣的看法如何呢？在1918年6月14日〈日日小筆〉中，他提出對朝鮮、滿洲、臺灣三地的評論，認為朝鮮與滿洲呈顯著進步，卻惟有臺灣充滿惰性，缺乏作事精神。<sup>43</sup> 不過，他將臺灣視為通往南洋的玄關，發表將砂糖生產主力放在南洋，而以臺灣為稻米生產中心，顯示臺灣與南洋為產業發展上的共同體。<sup>44</sup> 或可說因為這是大谷光瑞對臺灣的初次考察，尚未有深刻的認識，故僅是由「殖民地」臺灣的地理位置與農業發展的觀點來出發。而另一方面，《臺灣日日新報》在1926年12月23日的〈大谷光瑞師の大乗佛教運動／資生產業

---

日），7版。

<sup>41</sup> 〈南征船凌海丸／其航路及び寄港地〉，《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15日），2版；〈凌海丸の歸港／光洋丸は沈没か〉，《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8月22日），7版。

<sup>42</sup> 〈田總督と光瑞師／門司迄同船す〉，《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4月12日），2版。

<sup>43</sup>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6月14日），3版。

<sup>44</sup> 〈砂糖會社を南洋へ移し／臺灣は米生産を本位とせよと／説く大谷光瑞伯〉，《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2月23日），2版。

是佛教顯現／最近トルコに活躍す〉中，指出他的產業活動是在實現大乘佛教積極正面入世的一面，對其農業發展活動持續報導。自1926年至1928年間，他除向土耳其政府購入土地設立農林興業會社，將當地農作物帶回上海實驗栽種，期待發展香料及農產品、養蠶等事業。之後又在1930年向各方努力交涉，欲將正在興盛發展中的臺灣香蕉，經由長崎銷往上海。在1932年出版的《昭和六、七年臺灣青果年鑑》中，上海已設有東隆洋行與興橋香蕉產辦公司兩間香蕉指定會社，是否與光瑞的推動有關，有待日後考證。這樣一個橫跨亞洲廣闊地域，編織龐大的事業網絡，對應他早期在西域的探險，以及這段時間仍持續佛經漢譯工作，呈現光瑞展現他的一貫信念，<sup>45</sup> 此部分透過本章最後一節的整理分析，可以呈現整體狀況。

此外，《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光瑞所寫的兩篇文章，1. 是寫給德富蘇峰之信〈大勢逆行論〉，主要從國家的角度出發，論及國家應向資本家施以嚴格管理，以此防止對資本家的放縱而危及國家。這封信原刊登在德富蘇峰創辦的《國民新聞》，從1920年3月8日至4月20日連續分為29篇刊登，內容其實還涵蓋了對農業與工業發展的想法，但《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僅分為兩篇刊登。<sup>46</sup> 2. 自1923年6月17日至7月21日，分成12

<sup>45</sup> 〈土耳其政府から／土地を借り受け／同國特産物の栽培／上海でも農作物試作／大谷光瑞師の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6日），2版；〈大谷光瑞師の大乗佛教運動／資生産業是佛教顯現／最近トルコに活躍す〉，《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2月23日），6版；〈臺灣芭蕉推廣消路／對上海大宗輸出／長崎組合成立福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30年4月11日），4版；臺灣青果研究會編纂，《昭和六、七年臺灣青果年鑑：芭蕉、鳳梨、柑橘、西瓜》（臺中：臺灣青果研究會，1932年），頁5。

<sup>46</sup> 〈大勢逆行論（上）〉，《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1年3月20日），5版；〈大勢逆行論（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0年3月26日），5版。

次刊登的〈支那論〉，這是對他長期生活的中國，針對政治現狀提出極為不客氣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卻對孫文的革命活動懷抱深切期待。<sup>47</sup>不久，在報上日文版的「新書介紹」提到光瑞的《對支橫議》，往後陸續有《濯足堂漫筆》、《大谷光瑞全集》等。光瑞是當時日本社會中，廣為人知之人物，故《臺灣日日新報》節錄文章的部分以漢文刊登，推測主要在向臺灣人介紹、宣傳光瑞其人其事。

德富蘇峰描述光瑞為傳播佛教與開拓東亞資源，最重要的兩個武器為演講與著作，其中或有他的弟子幫忙撰寫，但多數為親筆著作，又因為豐厚的學識與旅遊，再加上寫作速度快，因此作品相當多量。

### (三)1935年～1941年

經過上述的階段，光瑞的南洋政策受到總督府重視，已不言而喻。從1935年開始，他不僅親身參與臺灣產業的開發，並且也顯現了對臺灣的影響力。由於九一八事變，總督府確立了臺灣為南進重要基地的本位政策，因此在1935年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緊接著在1941年中日戰況緊繃、珍珠港事變前夕，總督府意圖使臺灣工業化，來配合日本的戰爭需求，而召開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此兩場由總督府主持的重要會議，光瑞皆投身其中，前者以「蘭領印度農林工業株式會社」身分，後者以內閣參議身分出席，有關此兩場會議的詳細情況，將於下章進

---

<sup>47</sup> 〈支那論〉，《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3年6月17日），6版、（6月19日），5版、（6月26日），5版、（7月6日），5版、（7月7日），6版、（7月8日），6版、（7月10日），5版、（7月11日），6版、（7月14日），5版、（7月17日），5版、（7月20日），6版、（7月21日），6版。

行討論。而此期的《臺灣日日新報》的光瑞報導，也集中在這兩場會議的前後時期。

光瑞在1935年2月為視察臺灣的熱帶農林產物而第三度來到臺灣。接受訪談時，特別提到拓務大臣兒玉秀雄（AD.1876-1947）對此行的支持鼓勵，<sup>48</sup> 接著以主賓身分接受總督府晚餐宴，又在接受西本願寺的歡迎會同時，決議組織後援會「臺灣光瑞會」，此後援會的組成如同日本、滿洲和上海的光壽會一樣，會員皆以日本人為主，經常舉行他的佛教、產業、政治等議題演講，此顯示了他的影響力延伸至臺灣。<sup>49</sup> 接著他前往全臺各地實地調查各項作物及工礦業，並於3月8日在臺北別院向光瑞會會員發表這次的考察感想，演講「臺灣的經濟價值」，其宗旨雖肯定了臺灣的資源豐富，但強調「鐵道等交通機關的基礎設施緩慢」，他認為臺灣雖在1908年完成西部縱貫鐵路，然遠遜於日本國鐵、南滿洲鐵道與朝鮮總督府鐵道，因此從曾遊歷各地的光瑞眼中來看，不免發出「我以為這是輕便鐵路。但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再看它行走的時候，才知道它真的不輕便。」這句揶揄的話，後來交通時代社臺灣支社長羽生國彥將這段話收錄在《臺灣の交通を語る》中。<sup>50</sup> 《臺灣日日新報》將這場演講的內容，於3月9日至3月17日分8次刊登。<sup>51</sup>

---

<sup>48</sup> 〈脂粉の香を漂はせ / 高千穂丸が入港 / 大谷光瑞氏や中瀬殖産局長 / 助川中佐、日下知事らも便乗〉，《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17日），7版。

<sup>49</sup> 〈總督官邸で晚餐會 / 大谷光瑞氏を主賓に〉，《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19日），7版；〈臺灣光瑞會 / 組織するに決る / 同會で光瑞氏が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22日），2版。

<sup>50</sup> 羽生國彥，《臺灣の交通を語る》（臺北：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1937年），頁138。

<sup>51</sup> 〈大谷光瑞氏がアツサム茶園視察 / 督府谷村技師の案内で現地へ / 或は同

另外，光瑞將此次考察寫成《臺灣島的現在》一書，並於該年10月15日出版，全書分為氣象、土壤、農業、林業、畜產、水產、鑛產、工業、交通、觀光遊覽、結論，共計11章。從內容來看，該書〈第1章氣象〉開宗明義即言「臺灣島為我帝國之如意珠寶」，即凡我（日本帝國）所期望之地，其地皆有所產，並認為今日之急務並非在北方，相反地南方之緊急尤勝於北方，因此必須考慮臺灣的熱帶特性並加以利用。<sup>52</sup> 而在此書中對產業的描述，尤以農業佔最大篇幅，他積極提倡棉花、大麻、黃麻、苧麻、亞麻、甘藷、小麥、落花生、鳳梨、香蕉、柑橘、咖啡、可可、蔬菜等種植。對這些作物的提倡，正值總督府對臺灣進行農業改編之際。由於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因原住民抵抗、毒蛇瘴癘、地勢與交通等原因，山地仍處未開發狀態，但此時平地農業發展飽和，於是政策上，擬獎勵種植適宜山地種植的熱帶特種作物，故在1935、36年重新擬定山地開發綜合計畫，總督府也撥付調查費進行調查。<sup>53</sup> 由這點來看，光瑞此行的調查與總督府的農業改編政策似有某種程度的連結。也可見因光瑞的調查詳細並對產業有一定認識，因此參考價值高。所以，當「臺灣日日新報社」社長河村徹介紹此書時亦言，此不單僅是事實敘述，更放入大谷光瑞之抱負，內容詳盡宛如

---

事業に乘出す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5日），5版；〈魚池産の紅茶 / 優品との折紙附く / 大谷光瑞氏の講評〉，《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7日），3版；〈曷參種製茶 / 味水色佳 / 不讓外國茶〉，《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35年3月7日），8版；〈光瑞會員 / 二百餘名 / 八日も會場で / 申込を受く〉，《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3月8日），2版；大谷光瑞演講「臺灣の經濟價值」，《臺灣日日新報》分於1935年3月9日、10日、12日-17日刊登。

<sup>52</sup> 大谷光瑞，《臺灣島之現在》，頁3、646。

<sup>53</sup>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77。

「臺灣大百科全書」，河村徹強調當前的國策是帝國的南方發展，是大和民族應行之處，因此對臺灣的再認識為眼前急務，而此書的出版即在解決帝國南方發展問題，而臺灣產業的開發就是日本生命線的一部分。<sup>54</sup> 另外，此書內容在南進政策上，依產業項目做實際調查後，提供了相關建議，可說是不同於以往從歷史變遷與政策面來撰寫的經濟理論著作，故被當時同為強調臺灣南進政策的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將此書與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1929年出版）、高橋龜吉《現代臺灣經濟論》（1937年出版）並列在其出版的《臺灣經濟年報》中。<sup>55</sup>

1935年這一年，《臺灣日日新報》從3月23日到10月25日詳細報導熱帶產業調查會議從籌備到召開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光瑞在搭乘「高千穗丸」往臺灣途中的談話，表示有意於高雄從事貿易，並在會議結束後，繼續停留臺灣考察。<sup>56</sup> 自熱帶產業調查會議結束後，大谷光瑞接續該年2、3月未完成的調查，先往阿里山、臺南、高雄，之後再移動到新竹州視察茶與加工等。

1935年的臺灣視察，是促進光瑞開始臺灣熱帶產業發展的關鍵。翌年1936年2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大谷光瑞為「配合南方國策，應挺身支持帝國的南方發展政策，而計畫以高雄為中心，經營果樹園、製造紅茶等各種事業」，故決定常住高

---

<sup>54</sup> 河村徹，〈日本の生命線『臺灣島の現在』 / 大谷光瑞師の名著〉，《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2月5日），4版。

<sup>55</sup>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1年），〈序〉頁1。

<sup>56</sup> 〈熱産委員出發 / 神戸から高千穂丸らで / 大谷光瑞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14日），7版。

雄。接著在高雄購入土地並製定農園經營計畫，且計畫設置罐頭加工工廠，種植蔬菜並將之輸往滿洲，此外，也將在高雄開發南方漁場。<sup>57</sup> 光瑞以高雄作為南進政策的目標非常明確，因此選定大港埔土地，開始進行逍遙園別墅的建築，並在1940年11月1日正式開園。逍遙園是他在臺灣實現熱帶產業的據點，由「大谷學生」在此從事農園活動。<sup>58</sup>

由於熱帶產業調查會注重臺灣軍需工業問題，故幾乎沒有提起栽植農產作物，但光瑞本身可說非常關心臺灣農產作物，因此他買下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及埔里一帶的高地並栽培紅茶，又在屏東郡麟洛農園栽培檸檬。在逍遙園建築完成後，又在大谷農園設立罐頭工廠，計畫將農園栽培的蔬菜輸出滿洲。限於資料關係，我們很難瞭解大谷農園究竟能有多少產量的蔬果供應到滿洲，但光瑞一向看重滿洲拓墾，在那邊也擁有畜牧與農作物的農園，1933年曾派遣滿蒙少年團進行滿洲移民前置工

---

<sup>57</sup> 〈大谷光瑞氏が / 今年高雄に移住 / 柑橘園の經營と山茶の製造に / いよいよ本腰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20日），5版；〈光瑞氏の農園候補地 / 買収交渉が成立 / 滿洲向けの蔬菜を栽培〉，《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19日），2版；〈南方漁場の開發に / 大谷光瑞氏乗出す / 使用船は竣功次第高雄に廻航〉，《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7月28日），9版；〈大谷農園内に罐詰工場設置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1月16日），5版。

<sup>58</sup> 所謂「大谷學生」，是光瑞為順利進行宗派的改革、海外傳教、海內外產業開發，使能成為充分實現自己的想法與接受命令的股肱，認為有培育能輔佐自己事業的人才之必要。自1910年-1941年共募集238名，1910年-1914年主要在武庫佛教中學授課，以寺院弟子教育為主，光瑞辭去法主後改為私立學校教育。但大谷學生的教育內容依時間、地點有很大差異，學生無須負擔學費與生活費，修業後即輔助光瑞的事業，前往中國或南洋各地，故也確保了學生的出路。參考（小出享一，〈大谷學生と瑞門會〉，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頁447-476。另有關逍遙園的研究，可參考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と台灣—「逍遙園」を中心にして〉，頁125-136。

作，因為他注意到滿洲氣候嚴寒不利蔬菜成長，故有將臺灣蔬菜輸往滿洲之舉。從光瑞的行動中，或許可以看出他對亞洲地域整體的經營輪廓。接著，從1937至1939年，他把南洋帶回的可可樹捐贈給臺東試驗場，並倡議在臺灣高地種植稻米，也針對臺灣米、糖摩擦問題發表看法。<sup>59</sup> 然而，由於1942年他接受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一職，以及同年大谷學生返日休假，便不再回逍遙園，應該也是宣告停止了農園的所有活動。<sup>60</sup>

在光瑞對臺灣產業的開發投入心血的這段期間，因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臺灣戰略地位益形重要，1941年總督府為召開臨時經濟審議會，光瑞擔任委員出席會議，《臺灣日日新報》刊出臨時經濟審議會委員談話，光瑞仍然特別強調整備臺灣，建設鐵路的重要性。<sup>61</sup>

讓臺灣成為日本向南方發展的據點，是總督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貫持有的目標，因此，儘管日本尚未確立南進政策，但總督府已展開對南支南洋的調查與日本企業的南洋開發補助，之後又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正視南方的發展政策，總督府在這之後進行的積極作為，應該可以理解《臺灣日日新報》對光瑞的重視了。

#### (四) 光瑞的著作

<sup>59</sup> 〈大谷光瑞氏がカカオを寄贈 / 台東試験場で育成〉，《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2月5日），7版；〈臺灣ての高地米作を提唱 / 十四日神戸乗船 / 大谷光瑞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15日），2版；〈米と砂糖摩擦 / 今後緩和されん / 劉山林課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1月25日），7版。

<sup>60</sup> 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頁127。

<sup>61</sup> 〈工業臺灣を衝く（四） / 慾を言へば海岸線に / もう一本の鐵道を！ / 臺灣經審委員大谷光瑞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0月27日），2版。

由以上來看，光瑞除了傳教、探險、產業開發等行動外，撰譯佛典，以及撰著產業及局勢觀察等方面議題，也是重心，本節主要整理其著作。

前述光瑞的好友德富蘇峰，描述光瑞為傳播佛教與開拓東亞資源，最重要的兩個武器為演講與著作，其中或有他的弟子幫忙撰寫，但多數為親筆著作，又因為豐厚的學識與旅行，再加上寫作速度快，因此作品數量很多。其著作可由表1整理自大谷光瑞猊下紀念會編輯的光瑞年譜來看。

表1 大谷光瑞相關著作※

時期	書名 (出版年)
1930年前	大無量壽經義疏 (1914)、西域考古圖譜 (1915)、放浪漫記 (1916)、慨世余言 (1917)、第一義諦 (1918)、極樂莊嚴 (1920)、大勢逆行論 (1920)、危險思想論 (1921)、帝國之前途 (1921)、佛教の要諦 (1921)、大乘 (雜誌, 1922-1943)、見真大師 (1922)、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話 (1922)、他力真宗 (1923)、佛說阿彌陀經講話 (1923)、佛教の原理 (1924)、對支橫議 (1924)、濯足堂漫筆 (1925)、孫子新註 (1926)、梵語原本無量光如來安樂莊嚴經 (1929)
1930年後	國民之自覺 (1930)、佛教の大意 (1930)、無量光如來安樂莊嚴經講話 (1930)、食 (1931)、世間非世間 (1931)、國產之愛用 (1931)、妙法蓮華經講義 (1931)、花 (1931)、支那事變と我國民之覺悟 (1931)、支那の國民性 (1932)、支那の將來 (1932)、支那古陶瓷 (1932)、大國民讀本 (1932)、無題錄 (1932)、現下に處して國民は如何にすべきか (1932)、滿洲國之將來 (1933)、維摩經

	講話（1934）、大谷光瑞全集（1934）、臺灣島之現在（1935）、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講話（1935）、梵文邦議入楞伽經（1936）、光瑞縱橫談（1936）、現下の時局について（1936）、不空絹索神變真言經（1937）、支那の將來と我帝國の使命（1937）、大方廣經佛華嚴經（1938）、大陸に立つ（1938）、大谷光瑞興亞計畫（1939）、支那の將來に於ける施設（1939）、熱帶農業（1940）、蘭領東印度地誌（1940）、隨筆百則（1941）、印度地誌（1942）、支那鐵道建設計畫（1943）、中支地誌（1944）
--	---

※編者按：書名本應加《》，但書目繁多，恐致混雜，所以不加。

資料來源：大谷光瑞猊下記念会編，《大谷光瑞師の生涯》（東京：大空社，1994年），頁132-147。

本章開頭曾提到1930年是光瑞開始關注臺灣的開始，故表1以此作為分界，以方便說明光瑞著作的階段性變化。從表1來看，光瑞的著書主要以佛教書籍與東亞資源兩方向為主。由著書的對象與目的來看，佛教書籍方面，主要做重要典籍的摘要與解釋；東亞相關書籍，則是描述當前現況，以及提出問題與解決方法，即《大谷光瑞興亞計畫》全十卷、《臺灣島之現在》、《蘭領東印度地誌》一卷、《印度地誌》一卷、《支那鐵道建設計畫》一卷、《中支地誌》一卷等皆是在實地調查後，詳細編寫的重要文獻，另外對中國的著作，則有許多方面與政治局勢相關。

從著書與出版時間來看，第一本《西域考古圖譜》出版在1914年，這是他任職法主期間間惟一的出版品，不久，他辭掉法主，離開日本，赴中國、印度等地旅行，同時也來到臺灣，並開始南洋熱帶產業開發，但1918年7月6日時，創立了梵本翻譯機關的「光壽會」，此後有許多佛教相關經典出版。以1930年做

分界，在此以前可以看出專注在佛教經典的注釋，在此之後除佛教書籍外，隨著日本帝國對外政策的發展與中日關係變化，先是中國方面的著書，然後是延伸至南洋，構畫一個大的亞洲區塊構想。其在1939年7月至1940年2月出版全10卷的《大谷光瑞興亞計畫》，提出由中國到南洋，在水利、鐵路、港口、農業等各方面具體的開發計畫構想，應該是最好的說明。

1930年是長期對南洋熱帶產業的關心並在當地發展的光瑞，將目光移轉到臺灣發展熱帶農業的時期，此時的大谷光瑞有別於1930年以前，因長期滯留中國、南洋，而少有臺灣接觸的情況，不僅在1930年後頻繁來臺訪問，且言必強調熱帶產業於日本帝國的重要性，因此，1930年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 四、大谷光瑞參與臺灣產業發展的會議

##### (一) 臺灣與「高度國防國家」建設

日本統治臺灣後，皆以殖民統治為基軸，一切建設與發展都在配合日本國策。初期開發方針以農業為主，工業僅為糖業相關之農產加工與手工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才又發展紡織業、金屬、機械、化學等。<sup>62</sup>

由於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面對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的巨大轉變，著手調整臺灣農業與工業的政策——提倡農業重組的多角化發展，並開始工業化，臺灣乃成為日本向大陸華南及東南亞推進的主要基地，於是進入「準

---

<sup>62</sup>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頁19-24。

戰階段」，以「國防國家建設」為目標，開始統制重要產業及農業工業化，以便就近提供此區域內日軍的軍需補給品。

總督府對臺灣展開的工業化建設，是在1934年完成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後，從此帶動工業與農業加工業，臺灣於是具備了工業化的雛形。至1936年9月海軍預備役大將小林躋造（AD.1877-1962）出任臺灣總督，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項治臺方針，更積極推行臺灣工業化。故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臺灣得以擔負「高度國防國家」重要的一翼，取得日本南進的「基地性」，換言之，就是將臺灣「內地化」，編入了日本的總體戰體制。<sup>63</sup>

如此，在臺灣確立了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後，臺灣的經濟政策隨著日本國策改變與日本國內產業之發展需要而調整。大致上，以1930年為分界，前為「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期，後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期。總督府針對臺灣產業提升與工業化，展開連續幾個為臺灣產業經濟，做綜合性政策企劃的審議會，網羅日本、臺灣或南洋等軍政、民間有力人士參與，自1930年臨時產業調查會、1935年熱帶產業調查會、1938年臺灣重要產業調整委員會、至1941年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擬定工業發展政策，與臺灣的發展關係緊密相連。<sup>64</sup>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面臨本國的工業危機以及南進政策的逐漸確立，企圖對臺灣推行工業化，以行「帝國內分工」。然而，這是經過不同階段的進行。總督府在1930年11月10日至14

---

<sup>63</sup>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年），頁3-4；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頁38。

<sup>64</sup> 河原林直人，〈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産業政策の転換期—臨時産業調査会粗描—〉，頁93-111。

日召開的臨時產業調查會，主要討論的農業部分有臺灣主要農作物與經濟作物的改良與扶助，另外是工業與貿易振興、海運之改善、及電力建設後之新興工業。會議主要還是著重在米、糖兩項的討論，對工業仍停留在調查、研究、實驗，以及如何引導等階段，因此並未有實質的工業化行動；這是因為此次會議並非結合日本國策，單純是以總督府的意向而召開，因而更多的意義是趨於「地方性」，於是此次會議後，臺灣的整體經濟發展並未有太多的改變，只能說是九一八事變前夕對實際狀況的反映。<sup>65</sup>

然而，九一八事變後，臺灣確立了南進政策前進基地的角色，於是，總督府分別召開1935年的熱帶產業調查會，與1941年的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兩場會議與日本國策緊密相關，因為會議是經由內閣會議許可，身為內閣參議的大谷光瑞也由此時開始高度參與臺灣的產業發展。

## (二)1935年熱帶產業調查會議

由於九一八事變後，臺灣社會也逐漸蒙上戰爭的陰霾，因此1935年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上別具意義。同年，總督府為了宣傳統治臺灣的功績，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以下臺灣博覽會），慶祝統治臺灣四十年。此時期，總督府積極發展南進政策，要以臺灣為基地，向東南亞延伸勢力，因此在這場博覽會也設有福建館，以及菲律賓、印尼、暹羅等東南亞地區的展覽館舍，以此宣傳南進政策的目的。

---

<sup>65</sup> 河原林直人，〈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産業政策の轉換期—臨時産業調査会粗描—〉，頁93-111。

另一方面，有別於始政記念，而是重新檢討臺灣的產業與經濟政策，以反映作為帝國南進政策下的「國家的意義」，於是同年10月19日至23日舉辦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主旨也揭櫫臺灣之地理位置接近南洋及華南，但因臺灣本地缺少工業原料，故欲由南洋及華南輸入，使臺灣工業範圍擴大，國際貿易範圍至南洋與華南等地區。

此次會議的組成，分別為會長中川健藏（AD.1875-1944）總督、副會長平塚廣義（AD.1875-1948）總務長，出席委員16名、島內19名，以及其他人士和臺灣總督府關係官吏，合計90名。又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之動機，既在強化臺灣與華南、南洋之關係，於是，會前將華南、南洋地區之糖業、林業、礦業、金融、貿易、運輸、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調查資料，編輯成40餘冊報告書，以供會議中提出討論。會議諮詢項目共分為貿易、企業及投資的助成、工業振興、金融改善、交通設施的改善、及文化設施的改善，共計有六號方案。再者，由於會議重點在南進政策，故聘請的委員除了相關的政府官員外，財界與南支南洋事業界的專家和實業家即佔四分之三，其中半數以上直接或間接在南洋經營橡膠、麻、甘蔗、椰樹、咖啡、可可、瓊麻、香茅、奎寧等熱帶農園，以及採礦、造林、漁撈等。在此特別提出的是，此次光瑞以出席委員身分列席，由於他為政界、財界、南支南洋事業界之權威，且於各方面的博覽強記，而特別受到注目與好評。<sup>66</sup>

接著，在19日首日的總會會議中，有委員提出組織特別委

---

<sup>66</sup> 覆面冠者，〈臺灣南進の大方針を確立：統治史上燦たり熱帶調査會〉，《交通時代》6卷12號（1935年12月），頁56。

員會，因而分為三個特別委員會，並在各特別委員會中分配討論項目，其內容如表2。

表2 熱帶產業調查會委員會與討論事項

特別委員會	討論事項	內 容
第一特別委員會 委員長： 賀來佐賀太郎	第一號振興貿易之事項	<p>因臺灣工業進步，本島與華南及南洋間的貿易關係，前途希望頗大，但以上諸地所採輸入防止政策難樂觀，應講求切實有效之策略。</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1. 砂糖、茶、香蕉、鳳梨罐頭、豬肉、煤、水產物、食鹽等增產及品質改善與輸出補償制度應擴充，並開闢新銷路。</li><li>2. 撤除關稅障礙、關稅減免政策。</li><li>3. 商品之宣傳調查。</li><li>4. 轉口貿易的進行。</li></ol>
	第三號振興工業之事項	<p>臺灣近南洋及華南等地，以上地區不但為工業原料生產地，且是一大消費市場。故臺灣應力圖工業化，不僅應臺灣及日本需要，並向南洋及華南等地開闢銷路，此類有希望之工業及資源，應作經濟方面與科學的研究，並扶助現有工業。</p> <p>其各項振興工業有：石油工業、無水酒精工業、肥料工業、食鹽及苦汁利用工業、纖維工業、油脂工業、香料及藥品工業、油漆工業（安南漆）、水產加工業、獸肉加工業、皮革工業。</p>

第二特別委員會 委員長： 井坂孝氏	第二號促進企業投資之事項	臺灣負有向南方開發的使命，有關南方企業投資應由政府與民間合力推進與協助開發。 1. 除官民經營投資者外，其於適宜投資對象尚多，應調查並向臺灣及在外臺灣資本家介紹，促其投資與進一步扶助。 2. 關於中小企業事項。 3. 關於臺灣移民事項。 4. 試驗研究及經濟調查：中央研究所及其他試驗機關擴充。調查研究島內外經濟，對開創新事業所需資料亦應供給。 5. 有力開拓機關的設立。
	第四號金融改善之事項	為貿易、企業及投資，對商業應進行開拓，對中小工業供給充分資金。
第三特別委員會 委員長： 原邦造氏	第五號交通設施之事項	為臺灣與各地之聯絡貿易的進展及企業振興，應力求交通設施之改善，諸如：陸運方面鐵道建築改良，運輸改善，公路新設改建；港灣方面的港灣改善，對華南及南洋諸港的海運連絡改善，航路航線、郵政、電信、電話等。
	第六號文化設施之事項	促使相互了解，相互親善，以便易於實行經濟合作，如宣傳報導、教育、醫藥、觀光遊覽、學術交換、熱帶學術研究等。

參考資料：覆面冠者，〈臺灣南進の大方針を確立：統治史上燦たり熱帶調査會〉，《交通時代》6卷12號（1935年12月），頁56-57。

如表2所示，由於討論議題廣泛，各特別委員會於各會議室

分別展開分擔議題的討論，光瑞雖未任委員長，但兼任各會委員奔走於各委員會，展開他的長辯之才。統括他在會議上發言的議題，集中在油脂工業、香茅油、無水酒精、纖維工業，石油工業、香料及藥品工業、肥料工業、水產及獸肉加工業，及罐頭工業、漁業、食鹽、皮革工業、無水酒精工業等，另外，他還注重並投資在和工業發展有關的資金、金融問題；在交通問題上，多以海運運輸路線及距離作考慮，而移民與觀光僅略微發言。<sup>67</sup>

也就是說，油脂工業、纖維工業、石油工業、肥料工業、皮革工業等，多與戰爭需用物資有關，香茅油、香料及藥品工業、水產及獸肉加工業及罐頭工業、漁業、食鹽是臺灣農產品加工工業，光瑞專注這些主題，著重此方面的發言。而這些討論日後多少也在1936年組織的半官半民的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中實現，該會社的成立是本次會議召開的最大目的，在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發揮了提供戰時軍需物品的功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成立，從時間上來看，相較於同屬國策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6年設立）和「東洋拓殖株式會社」（1908年設立）這兩間，整整遲了近三十年，因此，該會社的成立呈現戰爭目的外，也表現了日本帝國國策的趨向。

### （三）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進入戰時體制，

---

<sup>67</sup> 著者不詳，《[昭和十年十月]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年）。

總督府實施經濟統制政策，於翌年1938年同時召開「臺灣重要產業調整委員會」，以及實施「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畫」，此為配合軍事動員的計畫，一切以工業為優先，並運用統制資金、勞力、物資等措施，進行煤炭、金銀銅礦、石油、工業鹽、電力等產能的擴充，全力從事軍需工業之發展。而這項五年計畫，因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成與「熱帶產業調查會」的提案與實施，評估至1941年已完成大致的目標。

以振興臺灣經濟、工業發展、交通設施整備及再擴充為目的而設立的「臺灣經濟審議會委員會」，除了是遵循1930年以來數次召開的臺灣產業經濟會議之外，本次由總督長谷川清（AD.1883-1970）主導，以達成和日本本國有更進一步緊密關係目的之背景下來召開。此次審議會由總督府呈報內閣會議，並制定勅令制定官制，仍以臺灣總督為會長，委員為臺灣當前有力會社的代表者與邀請投資工業部門關係者，共計32名，另外列席代表有來自日本政府大藏、商工、農林、遞信、鐵道、拓務、外務各省及企劃院、陸海軍部等計有28名。會議自1941年10月27日至31日於總督府廳舍召開，會中分設第一特別委員會（工業部會）、第二特別委員會（交通部會），首日及31日為總會。<sup>68</sup>

會議召開的主旨，可由長谷川總督的開會致詞窺見一斑：<sup>69</sup>

1. 臺灣環境適於農業，因此統治臺灣後，發展了農業與農產品

<sup>68</sup> 楠井隆三，《戰時臺灣經濟論》（臺北：南方人文研究所，1944年），頁202。

<sup>69</sup> 同會編，《諭告訓達類聚》〈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に於ける長谷川總督開會の辭（十月二十七日）〉（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44年），頁185-187。

加工業，但世界局勢之發展，臺灣亦有謀畫工業之必要，以成為南進政策上經濟與國防的重要基地；2. 臺灣地理上，本就具有電力、煤礦等，及勞動力均甚豐富的優點，而資金與技術亦可得到各方面協助；再者，因接近華南及南洋，當可促進工業發展；3. 臺灣為日本南進政策之玄關，交通通信設施之整備亦屬必要之條件。

依據審議會的決議，發表了「工業振興方策要綱」，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振興工業上的必要對策，包括電力開發、煤礦資源開發、工業地區之形成、科學研究機關的整理與設立，確保材料、資金供給及勞務需求的調整；第二部分應提振的工業項目，包括製鐵、機械器具、造船、化學肥料、水泥、工業電石及其利用、紙漿、製油、碱水利用、天然瓦斯等多項工業。<sup>70</sup> 另外，「交通施設擴充方案」分為「基本方針」與「各部門別整備擴充案」，主要在確保各交通機關連繫、擴充內臺交通設施，與強化經濟、文化紐帶，確保臺灣陸、海運與港灣、航空和通訊等交通諸施設的能力與對南方交通圈的相應設施和協助等。<sup>71</sup>

此次，光瑞以近衛文麿（AD.1891-1945）內閣之內閣參議身分參加，雖擔任第二特別委員會委員長，但同時也兼任第一特別委員會委員，為期四天的會議中，他以交叉方式參與，然因10月27日缺席，以及31日第二委員會只會議13分鐘，因此，實際參與議論應該僅有兩天（表3）。

---

<sup>70</sup>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頁124-129。

<sup>71</sup> 楠井隆三，《戰時臺灣經濟論》，頁209。

表3 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會議時間

會議	時間
總會（開會）	10月27日：午前10時、午後2時
第一特別委員會	10月27日：午後2時
	10月29日：午前9時、午後2時
	10月30日：午前9時、午後2時
第二特別委員會	10月27日：午後2時
	10月29日：午前9時、午後2時
	10月31日：午前9時
總會（閉會）	10月31日：午前10時

參考資料：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に於ける長谷川總督開會の辭（十月二十七日）〉，《諭告訓達類聚》（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44年），頁1-3。

首先，第二特別委員會27日的代理委員長是「石原產業海運株式會社」社長石原廣一郎主持，僅以兩小時做「交通設施整備擴充方策答申參考案說明書」朗讀，與廣泛議論而已。29日由光瑞主持，當日一次就鐵道、海運、港灣、航空、通信等問題討論，討論項目雖多，但大致達成共識。在鐵路方面主張國有鐵路運輸的增強，包括雙軌工程、改建車站、增設調車場、改善通訊設備等改良工事，增添車輛與鐵道工場整備機關車、裝卸能力增強與裝卸機器設備及勞力維持，加強運輸統治重要物品的優先運送，此外，還有完成環島公路、開設中部橫貫公路、橋梁的增強與鋪設公路。光瑞一向主張交通問題是阻礙臺灣資源開發的主要原因，因此極力主張中部與南部橫貫鐵

路與東西聯絡道路的建設；另外，尋求汽車代用燃料也是當前急務。在海運方面，為提升工業運輸，須擴充臺灣與日本、南方的航道；與此相關也要擴充基隆、高雄、花蓮、蘇澳的港灣設備來促進工業港和建設商業港「新高港」（臺中）。航空方面，需加強臺灣與日本、廣東的航線，開設臺灣與華南、華中的聯絡線，以及南方循環線，並充實航空安全設施擴充臺北飛行場，此外，光瑞並提到水上機與陸上機的聯絡需要。最後在通訊方面，必須增設臺灣與日本海底電線，開設南方直達無線電與改善島內無線電報。<sup>72</sup>

接著，30日光瑞參加了第一特別委員會，討論水泥工業、碳化物及其利用工業、紙漿工業、煉油工業、鹼水工業、天然瓦斯，以及包括糠皮榨油、酵母、維生素C、魚類肝臟利用、皮革、纖維、鋁加工品、鎢、精煉金鋼砂、超硬質合金、硬質克羅米、礦金加工品、陶瓷器、玻璃花磁磚、漁具等類各項臺灣特有資源。光瑞對上列所有項目，皆以如何提升這些資源的產量、調查研究與相關運輸為提問重點，之後在臺灣特有資源利用上，補充植物性油工業在食用與工業的價值，申述其必要性與重要性。<sup>73</sup>

綜觀此次會議後的紀錄《答申案》，雖然在發展製鐵業、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等重化工業發展方面獲委員會認可；然由新聞報導中可以察覺，其中有委員主張，現況存在原料取得、資金與勞動力等非即刻能克服的困難，因此，發展臺灣重化工業的時期尚早，仍應由輕工業著手。然而，審議會在計劃

---

<sup>72</sup> 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臺北：臺灣總督府，出版年月不詳）。

<sup>73</sup> 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

要領中，提出讓臺灣總督有融資命令權、讓日本本國認識臺灣作為南進基地的重要性、招攬本國資本家、設立證券交易所、發動中央物動計畫調節材料、動用農村人力、農村機械化，及人材培育等計畫。而長谷川總督在閉會談話中，也再度強調臺灣的工業化須排除萬難，以應時局之需要。<sup>74</sup>

從上述的會議結果來看，是取得初步共識，因為翌年1942年起推動「第二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並通過中央的物資動員計畫，開始資金計畫的策畫與實施，由此可知，兩者間存在一定的關係。但必須注意的，在31日的總會，內地方面的委員對工業振興與交通施設整備的議題，整體認可，但對兩次會議進行答申（答覆）時，與其說是強調內、臺經濟一體化方針，無寧是在對實現議題的可能性激起了熱烈論戰，特別是尖銳提出臺灣工業化運動弱點，敦促當局的反省為多。亦即可說會議氛圍反映了內地對南進基地臺灣認識的深刻化、南方問題現實性的認識，於是果然於會議後四十日爆發太平洋戰爭。<sup>75</sup>

## 五、結論

大谷光瑞從甲午戰爭之後的1899年，展開海外活動，從中亞探險活動、中國等地的海外佈教、拓墾活動，至南洋產業發展，對應了日本開始向外發展帝國主義的背景；然而，自1930年開始，日本準備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開始重視臺灣的南進地位之際，光瑞參與的臺灣產業調查活動與會議，相較於之前

---

<sup>74</sup> 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頁411、430。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頁129-135。

<sup>75</sup> 楠井隆三，《戰時臺灣經濟論》，頁204-205。

的活動，顯得具有政治性。

光瑞在臺灣的主要活動，由臺灣產業活動調查開始，雖然實地調查了農林礦工所有方面，卻可以看出他個人熱衷於農作栽植；但另一方面在參與總督府的產業會議上，卻能侃侃而談臺灣工業、交通的發展政策，無論從任何方面，光瑞的思考都是將臺灣作為南進的出發點，而連結到南洋與中國華南，甚至滿洲，這樣的一個網絡可以說是符合日本國策的發展構想。

隨著日本開始對中國展開侵略行動，光瑞的身分由實業家漸轉為政治型人物，1939年任興亞學院名譽院長、1940年任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的內閣參議、1942年任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1943年任大東亞佛教總會名譽總裁、1944年任小磯國昭（AD.1880-1950）內閣顧問等職，這些職務都與日本強化戰爭體制有關，其中，光瑞還以第二次近衛內閣內閣參議身分參與1941年的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在發言與地位上皆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論文雖旨在闡明二次大戰下，大谷光瑞在臺灣的活動，然而若不能清楚他之前在亞洲地域的活動，將難以明白他在臺灣發展的時空背景和與臺灣產生的連結關係。只是本文透過現有資料分析，雖然能瞭解他在臺灣的行動，但他何以能受到總督府特別的重視，其人脈網絡如何連結，以至於《臺灣日日新報》特別關注報導等，是非常耐人尋味。

1945年光瑞在大連迎接了日本敗戰，在當地被拘留至1947年返回日本，1948年病歿於大分縣別府市。橫跨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大谷光瑞，其一生活動是日本近現代史的一幅縮影，而他堅定以臺灣為南進基地的想法，對戰時體制下的臺灣

進行工業化提出許多積極性建言，應該也能說是對「開國進取」明治精神的一種信念的實現。



(收稿日期：民國105年3月13日；結審日期：民國105年4月19日)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文獻

1. 大谷光瑞，《臺灣島之現在》，大阪：大乘社，1935年。
2.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
3. 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に於ける長谷川總督開會の辭（十月二十七日）〉，《諭告訓達類聚》，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44年。
4. 同會編，《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臺北：臺灣總督府，出版年月不詳。
5. 羽生國彥，《臺灣の交通を語る》，臺北：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1937年。
6. 高楠順次郎編，《中等教科書佛教辭典》，東京：大雄閣，1932年。
7. 殖產局商工課，〈自大正四年南支南洋邦人助成事業一覽表〉，《熱帶產業調查書：南支南洋ニ於ケル邦人企業ノ助成（昭和十年八月）》，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5年。
8. 著者不詳，《[昭和十年十月]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年。
9. 楠井隆三，《戰時臺灣經濟論》，臺北：南方人文研究所，1944年。
10. 臺灣青果研究會編纂，《昭和六、七年臺灣青果年鑑：芭蕉、鳳梨、柑橘、西瓜》，臺中：臺灣青果研究會，1932年。
11.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1年。

12.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年。
13. 覆面冠者，〈臺灣南進の大方針を確立：統治史上燦たり熱帯調査會〉，《交通時代》6卷12號，1935年12月。

## 二、單刊本

1. 大谷光瑞猊下記念会編，《大谷光瑞師の生涯》，東京：大空社，1994年。
2. 白須淨真編，《大谷光瑞と国際政治社会—チベット・探検隊・辛亥革命》，東京：勉誠出版社，2011年。
3. 江燦騰，《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
4.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
5. 江燦騰，《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去殖民化與臺灣佛教主體性確立的新探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6. 江燦騰、侯坤宏、楊書濠合著，《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臺北：五南圖書，2011年。
7.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1年。
8. 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
9.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の研究—アジア広域における諸活動》〈大谷光瑞と台湾—「逍遙園」を中心にして〉，東京：勉

誠出版社，2014年。

10.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11.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
12.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年。
13. 闕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4年。
14. 闕正宗，《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新北市：博揚文化，2011年。

### 三、單刊論文

1. 小出享一，〈大谷学生と瑞門会〉，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
2. 小林英夫著・許佩賢譯、鍾淑敏・蔡采秀校訂，〈從熱帶產業調查會到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年。
3. 川邊雄大，〈大谷光瑞と中国布教〉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
4. 王娜，〈中國の大谷光瑞像及びその研究について〉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

勉誠出版社，2012年。

5. 加藤斗規，〈大谷光瑞と台湾〉，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2年。
6. 加藤斗規〈大谷学生と南洋〉，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
7. 河原林直人，〈植民地官僚の台湾振興構想—臨時台湾經濟審議會から見た認識と現実—〉，收入松田利彦・やまだあつし編，《日本の朝鮮・台湾支配と植民地官僚》，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年。
8. 柴田幹夫，〈大谷光瑞小伝〉、〈大谷光瑞研究の実情と課題〉，收入柴田幹夫編，《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東京：勉誠出版社，2010年。

#### 四、期刊論文

1. 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臺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年2月），頁191-222。
2. 河原林直人，〈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産業政策の轉換期—臨時産業調査会粗描—〉，《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51卷1号，2006年9月。
3. 河原林直人，〈熱帯産業調査会開催過程に観る台湾の南進構想と現実—諸官庁の錯綜する利害と認識—〉，《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47卷4号，2011年3月。
4. 長岡新治郎，〈熱帯産業調査会開催と台湾總督府外事部の

設置〉，《東南アジア研究》18卷3号，1980年12月。

6. 范純武，〈日本佛教在日治時期臺灣「蕃界」的佈教事業：以真宗本願寺派為中心的考察〉，《圓光佛學學報》第4期，1999年12月。
6.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
7.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期，2004年12月。
8. 羅玲，〈從“草堂佛教”到“護國佛教”：論佛教傳入日本的社會條件〉，《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卷3号，2011年5月。

## 五、學位論文

1. 黃朝煌，《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高雄：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六、網路材料

1. 田原純一，〈明治—大正 国際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先覚者気骨の言論人：天南こと田原禎次郎について〉，網址：<http://homepage2.nifty.com/tahara~d-c/teijiro.html>，檢索日期：2015年8月3日。
2. 坪井俊映，〈護國佛教史上に於ける淨土教の地位〉，《南瀛佛教》20卷10号，1942年10月，參閱臺灣佛教史料庫，網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ny/index.php?i=ny20-10>，檢索日期：2016年10月18日。

3. 花山信勝，〈日本佛教の實踐〉，《南瀛佛教》20卷12号，1942年12月，參閱臺灣佛教史料庫，網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ny/index.php?i=ny20-12>，檢索日期：2016年10月18日。
4. 真宗教團連合，網址：<http://www.shin.gr.jp/>，檢索日期：2016年10月7日。
5. 《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YUMANI清晰電子版，1898年5月6日至1944年3月31日），網址：<http://p81-tbmc.nlpi.edu.tw.epoxy.nlpi.edu.tw:2048/cgi-bin2/LiboCgi.exe>（請使用IE瀏覽器），檢索日期：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25日。



